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作者：吴晓波

目录

[序 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上篇](#)

[自由与理想](#)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为中年作准备](#)

[我的偶像李普曼](#)

[书籍让我的居室和生活拥挤不堪](#)

[读书与旅行还真的不是一回事](#)

[在别人的胡须里迷路](#)

[我们为什么孤独？](#)

[被知识拯救的生命](#)

[其实那年我也有50万](#)

[时间让你与众不同](#)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把人引向毁灭的从来不是金钱](#)

[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唯一生生不息的是野草和青年人的梦想](#)

[对峙本身真的是一种胜利吗？](#)

[冷漠是成熟的另一个标签](#)

[骑到新世界的背上](#)

[我的总编同学们](#)

[花开在眼前](#)

[只有廖厂长例外](#)

[找到廖厂长](#)

[江南踏春遇布雷](#)

[生命如草润细物](#)

[即将失去的痛楚](#)

[特里莎修女：我是上帝手中的一支铅笔](#)

[我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

[这一代的台北](#)

[这一代的上海](#)

[这一代的杭州](#)

[下篇](#)

[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

[商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

[你唯一需要保全的财产](#)

[苍狼终将消失](#)

[春节的酱鸭](#)

[岛上杨梅初长成](#)

[去日本买只马桶盖](#)

[拒绝转型的瑞士钟表匠](#)

[知道鹿晗的请举手](#)

[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

[被泡沫毁坏的人生](#)

[算算你的“屌丝值”](#)

[工人阶级的忧伤](#)

[“原谅我吧，兄弟们”：工人阶级的诗](#)

[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座“哀牢山”](#)

[宋林的悲剧](#)

[“病人”王石](#)

[那把椅子还在吗？](#)

[如果乾隆与华盛顿在小吃店会面](#)

[从汴梁到比萨有多远？](#)

[我们为什么特别仇富？](#)

[玉石为何比鹅卵石更值钱？](#)

[科斯与儒家](#)

[官商是一些怎样的“大怪物”？](#)

[日本人为何以“边境人”自居](#)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再也不会再有德鲁克了](#)

[大佬的黄昏——霍英东和他的时代](#)

[如果邓小平是企业家](#)

序

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E.B.怀特和约瑟夫·布罗茨基是我特别喜爱的两位美国随笔作家。

前者生活在富足而多彩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年为《纽约客》撰稿，几乎创造了风靡一时的“怀特体”；后者生于铁幕下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曾被当作“社会寄生虫”流放西伯利亚，后来遭驱逐而在美国大学安度晚年。怀特和布罗茨基分别说过一段让倾慕他们的写作者非常沮丧的话。

在自己的随笔集《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里，怀特哀叹说：“我想对写作者而言，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今的更为残酷——他们所写的几乎还没离开打字机，时代就让其变得过时。”

而布罗茨基则是在著名的《小于一》中写道：“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

这两位天才级的文体作家，其实道出了所有写作者内心的两个必有的恐惧：散漫的文字比时代速朽得更快，而作家的经历及思想很可能在不自觉地拾人牙慧。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拒绝出版散文集的原因。作为一位财经作家，我的文字的速朽度应该远远地大于优雅的怀特和饱受厄运的布罗茨基。我写专栏的历史始于遥远的1994年，篇什数目应超五百，但我并不觉得这些散布于各家报纸杂志的专栏文章，值得用书籍的形式留存下来。它们是那么的琐碎，那么的应景，那么的犹豫，就好比一位职业棋手平日打谱的棋局，真真不足为外人观。而今天，当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只能表明我已经承认衰老，我开始顾镜自怜，开始回望来路，开始用过来人的口吻试图对青年人说一些注定会被漠视的鬼话。

所以，这一本集子的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特别私人的事情。

在选编本书的那几个春夜，我好像一位旧地重游的旅人，小心翼翼地回到那些熟悉的街巷，尽量压低帽檐，避免遇到熟人，蹑手蹑脚，随时准备逃离。本书中的若干篇章，最旧的创作于15年前，那时的我，在文字江湖里籍籍无名，因而可以信口雌黄，横行霸道。渐至今日，我的某些文字已如躯干上的肌肉，服帖、松软而暗生褶皱。

当我把这些漂浮在岁月之河的文字打捞上来的时候，更像是在进行一次告别的仪式：我将封存青春，永不归去。

我们这一代，多少属于天生地养的一代。我们从贫瘠的物质和精神年代走出，在骨骼和思想长成的那些日子里，父辈奔波于生计，国家则忙于经济的复苏和意识形态的角斗，他们都顾不上好好看管我们。我们在学校里胡乱地读书，吃进无数的垃圾，却又在思想的荒原上肆意地寻觅疯长的野草。步入社会之后，既有的秩序濒于崩溃，“效率”替代所有的法则至高无上，而我们所储备的知识根本不足以应对很多突发的事件，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匆忙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在量化、冷酷的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在这一本集子中，你可以非常清晰地读出我所描述的景象，很多篇章中表现出来的自责与词不达意，是被击溃前的哀鸣，而另外一些篇章里的激越和温情，则是逃进书斋后的喘息与抵抗。

从2014年5月开始，我开设“吴晓波频道”，恢复了每周两篇专栏的写作节奏，这使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文章在社交朋友圈里流传得很广，本书中有将近一半左右的内容写于过去的这一年间。这一次的结集，继往于青葱，止步于当下，也算是一次长途旅程的即景记录。

如果说这些文字还值得阅读，仅仅在于布罗茨基所提供过的那个理由——“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毕竟，这是一个我们参与创造的时代，它一点也不完美，甚而不值得留恋，但是，它真的到来过，而且轰隆隆地裹挟一切，不容任何一个年轻人脱身旁观。

“我们都是精神上的移民。”这是我的职业偶像沃尔特·李普曼讲过的一句话。也许这是每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所难以逃避的宿命。他一生为美国人瞭望世事，铁口判断，但在内心，却始终难以挥散自少年求学时就已生出的疏隔感。

是为序。

吴晓波

2015年5月4日于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篇

自由与理想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我进大学听的第一次大型讲座，是在复旦4号楼的阶梯教室，因为到得迟了，教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我只能挂在铁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里伸。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刚刚如同幽灵般地袭入激变中的中国。

一位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站在台上，他大声说，上帝死了。

如今想来，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大抵是在那个复旦秋夜。我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这句诗也是在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但是过目即不忘，耿耿于怀。当时就想，中国书生的千年局促与荒诞就在这14个字里了，我们这一辈应该学习做一个“没有君王的书生”。

在大学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当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对社会无所求，社会于你亦无所扰。可是出了校门，后来的20多年，却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大学毕业是在1990年。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1992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闲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能在南方找到销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了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说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300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市里的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部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竖在茶几前。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看见此物——在当年它的价格相当于高级公务员10年的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

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

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第二年的工作目标。轮到我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5000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的我。

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基于财富的自由。

20世纪90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我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须寻租、无须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并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便如溪入壑，水涨船高。

2003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13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4A公

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3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1%实在不能让出来”。

但在我看来，那剩下的1%就是自由的疆界。

最后，我放弃了商业周刊的计划。因为，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办杂志，不能办电视台，不能办报纸，但我除了办媒体又不会干别的，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办出版。

出版的书号也是牌照资源，但它有一个“半公开”的交易市场。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实现。

于是，有了“蓝狮子”。从第一天起，它的股东就全数为私人。

十余年来，我一直被蓝狮子折磨。就商业的意义上，出版是一个毛利率超低、账期极长、退货率让人难以忍受的“烂行业”，在当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还在“先铺货，后收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蓝狮子名声在外，但规模和效益却不尽如人意。不过，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和沮丧过，因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紧的是，与我的众多才华横溢的朋友们相比，我没有为了理想，出卖我的“资本自由”。

浮生如梦，这一路走来三步一叹，别别扭扭。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与自由相比，理想则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和自我价值呈现的方式。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个“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但是，自由不可须臾缺失。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论及“人的荒诞性”，曾说，“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确认，他就难以摆脱”。

那么，一个人能否拥有与之制衡的能力？

加缪提供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

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和沮丧过，因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理想。

孙午飞 摄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家庭的年轻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未来。所以，如果你侥幸可以，请千万不要错过。

每个父亲，在女儿18岁的时候，都有为她写一本书的冲动。现在，轮到我做这件事了。

你应该还记得，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你一个问题：你长大后喜欢干什么？

第一次问，是在去日本游玩的歌诗达邮轮上，你上小学一年级。你的回答是：游戏机房的收银员。那些天，你在邮轮的游戏机房里玩疯了，隔三岔五，就跑来向我要零钱，然后奔去收银小姐那里换游戏币。在你看来，如果自己当上了收银员，那该有多爽呀。

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这个问题：你长大后喜欢干什么？

你一次又一次地更换自己的“理想”。有一次是海豚训练师，是看了戴军的节目，觉得那一定特别酷。还有一次是宠物医生，大概是送圈圈去宠物店洗澡后萌生出来的。我记得的还有文化创意、词曲作家、花艺师、家庭主妇……

16岁的秋天，你初中毕业后就去了温哥华读书，因为我和你妈的签证出了点状况，你一个人拖着两个大箱子就奔去了机场。你妈妈在你身后泪流满面。我对她说，这个孩子从此独立，她将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工作和城市，当然，还有喜欢的男朋友。

在温哥华，你过得还不错，会照顾自己，有了闺蜜圈，第一次独自旅行，还亲手给你妈做了件带帽子的运动衫，你的成绩也不错，期末得了全年级数学一等奖。我们全家一直在讨论你以后读哪所大学，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还是QUEEN（Queen's University，女王大学）。

又过了一年，我带你去台北旅行，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夕阳西下中漫步长长的椰林大道，我又问你：你以后喜欢干什么？

你突然说，我想当歌手。

这回你貌似是认真的，好像一直、一直在等我问你这个问了好多年的问题。

然后，你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看法，谈了对中国当前造星模式的不满，谈了日韩公司的一些创新，谈了你自认为的歌手定位和市场空间。你还掏出手机给我看MV，我第一次知道Bigbang，知道权志龙。我看了他们的MV，觉得与我当年喜欢过的Beyond和黄家驹那么的神似，一样的亚洲元素，一样的都市背街，一样的蓝色反叛，一样的如烟花般的理想主义。

在你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光。

作为一个常年与数据打交道、靠理性分析吃饭的父亲，我提醒你说，如果按现在的成绩，你两年后考进排名全球前一百位的大学，大概有超过七成的把握，但是，流行歌手是一个与天赋和运气关系太大的不确定行业，你日后成为一名二流歌手的概率大概也只有10%，你得想清楚了。

你的目光好像没有游离，你说，我不想成名，我就是喜欢。

我转身对一直在旁边默默无语的你妈妈说，这次是真的。

其实，我打心眼里认同你的回答。

在我小时候，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布置写作文“我的理想”，保卫祖国的解放军战士、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或者是遨游宇宙的宇航员。现在想来，这都是大人希望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其实大人自己也成不了。

这样的后果是很可怕的。记得有一年，我去四川大学讲课，一位女生站起来问我：“吴老师，我应该如何选择职业？”她是一位物理系在读博士生。我问她：“你为什么要读物理，而且还读到了博士？”她说：“是我爸爸妈妈让我读的。”“那么，你喜欢什么？”她说：“我不知道。”

还有一次，在江苏江阴，我遇到一位30多岁的女商人，她赚了很多钱，却说自己很不快乐。我问她：“那么，你自己喜欢什么呢？”她听到这个问题，突然怔住了，然后落下了眼泪。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从很小的时候，她就跟随亲戚做生意，从贩运、办厂到炒房产，什么赚钱干什么，但她一直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今日中国的90后们，是这个国家近百年来，第一批和平年代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你们第一次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它们甚至可以只与兴趣和美好有关，而无关乎物质与报酬，更甚至，它们还与前途、成就、名利没有太大的干系，只要它是正当的，只要你喜欢。

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真心地喜欢了，你才会去投入，才不会抱怨这些投入，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感情。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家庭的年轻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未来。所以，如果你侥幸可以，请千万不要错过。

接下来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特别的“乌龙”了。你退掉了早已订好的去温哥华的机票，在网上办理了退学手续。我为你在上海找到了一间日本人办的音乐学校，它只有11个学生，还是第一次招生。

过去的一年多里，你一直在那间学校学声乐、舞蹈、谱曲和乐器，据说挺辛苦的，一早上进琴房，下午才出得来，晚上回到宿舍身子就跟散了架一样，你终于知道把“爱好”转变成“职业”，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到底学得怎么样，是否有当明星的潜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确乎是快乐的，你选了自己喜欢走的路。

“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这是台湾黑松汽水的一句广告词，大概是12年前，我在一本广告杂志上偶尔读到。在遇见这句话之前，我一直被职业和工作所驱赶，我不知道生活的快乐半径到底有多大，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则是无效的，我想，这种焦虑一定缠绕过所有试图追问生命价值的年轻人。是这句广告词突然间让我明白了什么，原来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这次浪费是否是“美好”的。后来，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你认为它是美好的吗？如果是，那就去做吧。从这里出发，我们去抵抗命运，享受生活。

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18岁的女儿。

此刻是2014年12月12日。我在机场的贵宾室完成这篇文字，你和妈妈在旁边，一个在看朋友圈，一个在听音乐，不远处，工人们正在布置一棵两人高的圣诞树，他们把五颜六色的礼盒胡乱地挂上去。我们送你去北京，到新加坡音乐人许环良的工作室参加一个月的强训，来年的一月中旬，你将去香港，接受一家美国音乐学院的面试。

说实在的，我的18岁的女儿，我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怎样，就好比圣诞树上的那只礼盒，里面到底是空的，还是真的装了一粒巧克力。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吴晓波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59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